

陈学霖
著

劉伯溫與哪吒城

北京建城的传说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刘伯温与哪吒城

北京建城的传说

陈学霖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伯温与哪吒城：北京建城的传说 / 陈学霖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7

ISBN 978-7-108-02848-8

I. 刘... II. 陈... III. 城市史—研究—北京市 IV. 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0724 号

著作权所有：© 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中国境内（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除外）独家出版。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禁止以商业用途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散布、销售。

版权所有，未经著作权所有人书面授权，禁止对本书之任何部分以电子、机械、影印、录音或其他方式复制或转载。

刘伯温与哪吒城

——北京建城的传说

陈学霖 著

责任编辑 王振峰

装帧设计 宁成春 曲晓华 韩 宇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2007-477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7月北京第1版

200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16.75印张

字 数 180千字 插图 63张

印 数 0,001-10,000册

定 价 36.00元



柳 序

学霖先生千里迢迢地从远方把他的大稿《刘伯温与哪吒城——北京建城的传说》托人带来叫我阅读，并且为这书写一篇序文，这在我是一件极光荣的、乐意做的事情。学霖先生是史学家，像他的这一部大著，照传统的中国书籍的分类习惯，大概是归入史部地理类的，在性质上和—些纪风土的著作很相近，所以也并不曾离开史家的领域范围。正像已故的陈援庵先生（垣）撰文研究北京西长安街双塔寺的海云碑，那篇碑文也关涉元代开国的史料和海云和尚的个人事迹，学霖先生的这部大著，既提到元代的大都，也详论及明代的北京，它也涉及到元初的刘秉忠，元末明初的刘伯温（基）和明初的姚广孝（僧道衍）这些风云人物。虽然这么说，我看学霖先生的这部大著，也仍和许多史部地理类的其他著作，有很大的差别。老实说，我觉得像他这部书的写法，是打破了传统的史学书的樊篱，而为其注入了新的活生生的养料的，那就是说，它是用了史学的架构，去发掘民俗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新园地的。既说民俗，当然宗教也包括在内。它虽然不曾离开史学的大前提，但是它和普通的史学论文很不一样，它实际是要把史学多和旁的有血缘的学问接榫，开创新的途径，因而才扩大了研究的内容。

佛教密宗里的神毘沙门天王（Vaiśravaṇa）和他的第三个儿子哪吒（Nalakūvara）在宗教里是两个显赫人物，在中国的小说和戏剧里，他们早已华化了成为托塔天王李靖和哪吒，也已是妇孺皆知的了。哪吒在小说里是三头六臂，他有时候也有八臂哪吒之称，但是说他曾经用法力帮



刘伯温与哪吒城

助刘伯温和姚广孝为明成祖建造北京城，一切的皇城布置，都是照着他的身体各部分的形象安排的，却只是一段元、明以来记录绝少（不是没有）的民间传说故事。我们读历史的人都知道刘伯温和姚广孝是明初不同时候活动的人，刘基在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就死了，这个年份远在建文元年（1399）成祖起兵“靖难”之前二十多年，更不要提有机会替他重建北京城的后事了。姚广孝却是真正帮助成祖、策划起兵造反成功的人，当时的相士袁珙曾把他比作元代初年忽必烈下面的谋士刘秉忠，他也是个和尚。民间的传说不但把不同时的刘伯温和姚广孝拴在一起，还说伯温是刘秉忠的孙子，而事实上秉忠又是参与元初建造大都的人。这样不同背景的人，就在民间热闹的传说中被安排在一起了。这当然不是历史，甚至还不是说来头头是道的平话小说。然而它却真实地反映了民间老百姓爱听爱说的东西，也确切地反映出文化低层次的心理。

像这样的原始、粗糙、荒诞不经的故事，史部地理类收纳的是不多的。北魏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这部书，《四库提要》是收在地理类的，虽然其中的许多故事多以佛教为背景，然而也有更是民间的，如卷四“城西”有云：

阜财里内有开善寺，京兆人韦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丧而嫁，更纳河内人向子集为夫。虽云改嫁，仍居英宅。英闻梁氏嫁，白日来归，乘马，将数人至于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惊怖。张弓射之，应弦而倒，即变为桃人；所骑之马，亦变为茅马；从者数人，尽变为蒲人。梁氏惶惧，舍宅为寺。

南阳人侯庆有铜像一躯，可高尺余。庆有牛一头，拟货为金色，遇急事，遂以牛他用之。经二年，庆妻马氏忽梦此像谓之曰：“卿夫负我金色，久而不偿。今取卿儿丑多，以偿金色焉。”悟觉心不遑安。至晓，丑多得病而亡。庆年五十，唯有一子。悲哀之声，感于行路。丑多亡日，像忽自有金色，光照四邻。一里之内，咸闻香气。僧俗长幼皆来观睹。尚书右仆射元顺闻里内颇有怪异，遂改阜财为齐谐里也。



这两段故事在原文里是毗连的，因为它们都和阜财里有关系。后面一段无疑地是弘扬佛教的，但前面的故事却更像是本土的关系。韦英白昼现形，《左传》昭公七年记的“或梦伯有介而行”说来有点相似，《墨子·明鬼》下篇“杜伯乘白马素车……挟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车上”就是“实事”了。晚唐著《酉阳杂俎》的段成式，他的这部“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的书是《四库提要》收入小说类的。段柯古裒辑的材料，虽然不经，却和我们这里说的哪吒城这种记载的荒诞性质很相近，可以说是一类的东西。清初大诗人王渔洋（士禛）的《香祖笔记》卷六说：

古今传记……诞谩不经，然未有如《诺皋记》之妄者。一事尤可捧腹，云：“天翁姓张名坚，字刺渴，渔阳人。少不羈，尝罗得一白雀，爱而养之。梦天刘翁责怒，每欲杀之，白雀辄以报坚，坚设诸方待之，终莫能害。天翁遂下观之，坚盛设宾主，乃窃乘天翁车，骑白龙，振策登天，天翁追之不及。坚既到天宫，易百官，杜塞北门，封白雀为上卿。刘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灾。坚患之，以刘翁为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鄙倍至此，不可以欺三岁小儿，而公然笔之于书，岂病狂耶？段柯古唐之文人，何至乃尔！

王渔洋生当我们三百多年前，他的不能欣赏今日研究民俗人类学要视为奇珍瑰宝的材料，是不足怪的。老实说段柯古何止是“唐之文人”，他的父亲段文昌数任节度使大官，《旧唐书》说他“研精苦学，秘阁书籍披阅皆通”，大概不是溢美的话。在30年代杨宪益先生写文章，曾发现《酉阳杂俎·支诺皋》里有欧洲著名的灰姑娘（Cinderella）的故事，《杂俎》里所叙“古龟兹国王阿主儿者，有神异力，能降伏毒龙”又是西方尼伯龙根（Nibelung）故事的根源。其实，照民俗学的传说，这些同类的故事普通的分布，有时候是因为同样的心理状态往往会产生同样的行为，那些看似荒谬的故事、神话，其实还是较后的开化了的民族的许多礼俗、仪式的根据。清康熙间的刘献廷在《广阳杂记》卷二告诉他的朋



友韩图麟：“戏文小说乃明王转移世界之大枢机，……今更悟得卜筮祠祀为《易》、《礼》之原”，这才是明智通达有见识的话。

像上面引的这些材料，值得研究和保存是不待言的。然而因为古人有这种开明的见解的人不多，材料的湮没损失就十分值得惋惜了。例如明末有无名氏撰《如梦录》一卷，记叙当时开封繁盛的情况，大可以和《东京梦华录》竞爽了。这书被人郑重地保存了两百多年，只有抄本，到清咸丰二年（1852）才刻印，作序的常茂徕却以为原书太俗，说：

《录》中语多鄙俚，类皆委巷秕稗小说，荒诞无稽，为文人学士所吐弃，如言：繁塔为龙撮去半截，吹台是一妇人手帕包土一抛所成，北关关王赴临泉集买泥马，相国寺大门下金刚被咬脐郎缢死臂膊上，唬金刚黑夜逃出北门，诸如此类俚指难数，实堪捧腹。

所以这些材料都在付刻的时候不幸被像他那样的印书的雅人一刀删除了！学霖教授用史学家的眼光来处理哪吒城研究的题材，是为史学界的人士多开了一扇窗，这对研究历史，或是民俗学，或是广义的人类学，都是裨益很大的。我希望这一部好书的出版，会鼓舞起学术界人们更大的兴趣，更进一步了解雅和俗虽然不是漫无界说，但俗的东西其实另有一种更高更深的雅趣，如果我们能够打通樊篱的局限。

1994年5月，柳存仁敬序于澳洲堪培拉



缘起——自序

今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内里的嘉宾餐厅，大堂的尽头粉饰着一幅偌大长方形的壁画，描述一个玄怪的神话故事，七彩缤纷，艳丽照人，很容易吸引往来穿梭的旅客。这幅画以北京城作背景，上端有一座雄伟的五牌坊，底下左右角亘着一座不同形状的云山，每边的天空各有一个赤着身、只在肚腹土围红绫的小孩儿驾御着一条在腾跃的飞龙，其下左右各有三座彩色的旌旗，屹立在汹涌的波涛上飘扬。中央是一个镶着红光的大圆圈，内里有一个从滴溜溜、圆转如轮的五彩肉球走出来同一模相的孩儿。他头上梳着两个小抓髻，面如傅粉，唇似涂朱，金光射目，肚腹上围着一块红绫，露腿赤足，左手挽着一个金环，右手扣着一条红绸，每边足踝都套着一个金镯，围绕前后呼拥的又是几条腾跃的飞龙。

这幅壁画标题“哪吒闹海”，绘者是北京名画家张仃。稍知掌故的，都晓得哪吒便是小说传闻上“托塔天王”李靖的第三太子，俗称红孩儿，据说北京城是仿照这孩子的身躯画图样建造的。所以，这幅画的主题，就是北京家喻户晓的、大明军师刘伯温制造“八臂哪吒城”的故事。然而，这个故事是否出自谈天说地的齐东野语，编织虚构，或是别有来历，另有典故，可以从史籍文献探赜索隐？这个在现代北京脍炙人口的故事，虽然经过许多媒介传播遐迩，有几种参差的版本，但到目前为止，仍未有专书或论文考究它的来龙去脉。这本小书，就是为要打开这个谜团而作。

凡是写一篇文章、专书，去钻研某个问题，总有一点动机，而动机的诞生，不免有些因缘凑合。我写这本书，倒不是由于看到这幅“哪吒闹海”



的画触动灵感，因为故事极端错综复杂，千头万绪，若果没有特殊机遇，就算百折不挠去追索探究，周咨博访，亦未必能寻获轨迹，辨析原委。我写这本书，从孕育、构思，到找资料，以至断断续续的着笔，经过悠长的二十多个寒暑，是因为有一段因缘际会，现在趁杀青之日作一交代，并聊述个人研读国史的心路历程。

我原籍广东新会，生长于香港，中学及大学都在洋学堂度过，后来赴美国负笈研究院，毕业后执教彼邦，到1980年，已到不惑之年始有机会躬履北京故都。在这样的情况下，实在很难会沾上这一个题目，沉迷其间二十多载探幽寻秘，终于写成这本理应是寓居燕都、深谙京华掌故的学者或文化界人士所写的书。我有此机缘，是因为在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史学，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时，决定以明太祖的辅弼刘基（伯温）为对象，特别是探讨他在小说稗闻和民间信仰的神化过程。由于要研究刘基的形象的演变——如何从一位勋名盖世的明太祖佐命功臣，辗转蜕变为通晓天文历数、逆知未来，撰写《烧饼歌》预言书的神秘人物——就要探索他的各种传说，因此，务须解决这个刘伯温制造北京城的故事的来历。

在孩提时代，我已从长辈及邻里听到中国古代有位大名鼎鼎，神秘莫测的预言家刘伯温，但对这位叱咤风云的超凡人物的事迹，却茫无所知。直至1958年进入香港大学，上故罗师元一（香林）教授的中国通史课，才晓得他就是大明皇帝太祖朱元璋的帷幄谋臣、神算军师刘基，浙江青田人士，伯温是他的字，但在民间社会里，一向以刘伯温之名传世。后来选读《明史》，对刘基的勋业有更多的认识，但对他为何演变成神化的传奇人物却大惑不解。不过，当日年少旁骛，不屑局于一史，对于魏晋六朝、宋金元以至近代史都感兴趣，撰写过关于《金史》的纂修及史源，和中国首名留美学生容闳的年谱等论文，并未有投入钻研刘伯温的问题。大学毕业后，进入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成员之一的崇基书院当历史助教，兼在港大攻读硕士学位，最初预备随饶宗颐教授研究金朝元好问的文史之学，但后来为了配合教学需要改选北朝史为论文的范围，暂时搁置其他的研究。

1963年秋，我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奖学金，到该校历史系攻读博



士学位，但意想不到同时与刘伯温结下不解之缘。第一学年，除却修读几门外国史和社会政治学理论，选了牟复礼（Frederick w.Mote）教授的“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学期）和“中国文化史专题”（下学期）。牟师早岁游学华夏，取得金陵（今南京）大学文学士，学术湛深，识见渊博，是一位知名的汉学家。他曾师淑明史大师王崇武，因此在获悉我对刘基有认识，便鼓励我深造明史。上学期过后，牟师了解我的程度，不需上课，着我专注写一篇学术报告。当时便跟从他的建议，去探讨元朝忽必烈的汉人辅佐、释道兼资的刘秉忠（僧子聪）的功业，作为研究刘基进阶之门。这个建议洞烛精微，因为二者不但事业相埒，而且彼此都是风云人物，两者的传说有些夹缠一起，互相影响，况且研究明初历史需有元史的基础。学年结束，写成报告，辱承牟师嘉许，推荐到在荷兰Leiden出版的盛名汉学学报 *T'oung Pao*（《通报》）发表，结果在1967年刊出。这篇论文不但诱导我继续钻研蒙元史，而且对日后的刘伯温研究很有启示，因为由此发现刘伯温传说发展的两个关键，都来自刘秉忠，例如传说称刘伯温是刘秉忠的孙儿，而北京“哪吒城”故事又滥觞于刘秉忠建造大都城的异闻。前者我在草创论文时已从阅读《英烈传》发现，但是后者却要等待十年，到远赴澳洲堪培拉，参加由澳洲国立大学远东史系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博士主持的“元人传记计划”，撰写刘秉忠传，重新检读资料时始知晓。

在普林斯顿的第二学年，由于牟师休假他往，我便修读博士学位必须的其他外国史课目，和旁听刘子健教授的“中国政制史”及“宋史专题”，使我拓展视野并获得良师指导。同时，在学系的鼓励和资助下，我每周乘车往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参加由该校东亚研究系的明代思想史专家，狄白瑞（Wm.Theodore deBary）教授所主持的“明代研究讨论会”（Ming Studies Seminar）。这是每周一次的研究生集会，每次约三小时，题目包括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思想宗教、文学艺术等等，分别由哥大的中国研究教授和特约的国内外访问学者主讲。学员除却哥大的本科生，还有数名就读于毗邻大学的研究生，济济一堂，谈学论道，到会者深受其益。由此关系，我认识了哥大的名教授如狄白瑞、夏志清、蒋彝、唐德刚，及当时在该校主持“明



人传记计划”(Ming Biographical Project)的富路特(L. Carrington Goodrich)教授,和他的同事名学者房兆楹、杜联喆夫妇,也结识了日本的明代思想专家冈田武夫、酒井忠夫;还有,邂逅从前在香港见过面,但未有机会请益的澳洲国立大学中文系柳存仁教授。以上诸位鸿儒,特别是富教授、房氏伉俪及柳教授对我的研究都很感兴趣,热情鼓励和支持。富教授随约我撰写刘基传,数年后且邀请参加编纂工作,使我有好几年的机会潜心明史,至于柳教授对我的刘伯温研究更黽勉有加,这从他允肯为拙书作序见到。

1965年春间,我通过博士学位初试,于是集中精力,全神贯注撰写论文,题目是:*Liu Chi (1311~1375): The Dual Image Of a Chinese Imperial Adviser* (《刘基:一个中国皇帝的谋士的双重形象》)。主旨是探讨刘基在朝廷文书及士绅著作所表露的“官方形象”(official image),及如何蜕变成一个出现于小说稗闻、与前者迥异的“民间形象”(popular image),而贯穿二者是考究正史的刘基如何神化为传说中的刘伯温。普大拥有国际闻名的葛思德东方书库(Gest Oriental Library),庋藏汉籍善本及珍贵手稿甚多,内里恰巧有十来种署名刘基撰著的天文地理、历算术数的书,而且明清文集、笔记小说也占相当数量。此外,哥大的东亚图书馆亦藏有不少明清子集和近代汉学研究期刊,因此检读资料极为方便,左右逢源,如鱼得水。由于先前对明初史事已有粗略认识,论文架构早在胸臆,所以一旦搜集到基本资料便动笔。一年下来,我已拟好论文初稿,共五章,其中第四章考究刘基传说的演进占篇幅最多,亦有若干新意,忝获牟刘二教授的好评,认为对研究中国人物及明代史事都有创见。

简言之,这篇论文勾画出刘基神化过程的阶段。最初是当世文人烘托夸大他的才智事业——始作俑者是为他撰述行状的青田同乡,成为传说的基础。到万历中叶,演开国事迹的《英烈传》面世,将他塑造成小说化的传奇人物;在这里,刘基被虚构为刘秉忠的孙子,又变成《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一位能呼风唤雨的道士和神算军师。跟着坊间流传不少嫁名于他的天文地理、历算术数猥书,把他变得更神奇。到最后,由于反清复明的革命分子的煽动宣传,刘伯温进一步被神化为大预言家——遗下《烧



饼歌》推测未来天下国家的命运。以上所言《英烈传》对刘基神化的关键性，和剖析《烧饼歌》的来源——特别是它之脱胎于明初方外铁冠道人张中的传说，和最初的书名是《蒸饼歌》，都是新发现，使我感到兴奋不已。但是对另一种更玄异的传说——刘伯温制造北京城故事的来龙去脉，因为找不到线索，一筹莫展，无法交代。情急之下，唯有把习见的资料，如E. T. C. Werner, *Myths and Legends of China*, L. C. Arlington and William Lewisohn, *In Search of Old Peking*, 及金受申《北京的传说》所收的口语叙述综合作一介绍，并未试图分析。这篇论文在1966年秋间通过口试，我于是便以刘伯温研究取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跟着返港与翁健梅小姐订婚，未几，便应聘赴新西兰的奥克兰大学（University of Auckland）出任亚洲史讲席，开始漫长的教学生涯。

1967、1968这两年，我在奥克兰大学讲授中国通史及中国近代史专题，由于这些新设课程学生不多，教务轻松，亦无行政负荷，所以作息多暇。最初一年，便致力将论文部分改写成两篇单独的文章，一篇论《刘基的双重形象所反映的历史人物塑型》，另一篇谈《刘基在〈英烈传〉中的小说化过程》，分别刊于德国的《极东学志》（*Oriens Extremus*, 15. 1, 1968），和澳洲的《澳洲东方学会学报》（*Journal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5: 1~2, 1967）。我没有继续修改论文成专书，主因是环境迥异，奥克兰的汉文藏书贫乏，无法作深入的研究。所以第二年便改弦易辙，回复金史的探讨，草成一本史学史论集，书名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Chin Dynasty (1115~1234): Three Studies*（《金朝史学研究三种》）。这本书稿随送到德国明兴大学（Universität München）的傅海波（Herbert Franke）教授审阅，承他雅意，列为“明兴东方学丛书”（*Münchener Ostasiatische Studien*）第四种，于1970年出版。接着，傅教授邀我合作译注《金史》，计划编写、一本大型的《金代社会史》，因此二十年来大部分的精力都消耗于这方面，影响了刘伯温研究，久久未有进展。

在奥克兰期间，虽然学无恒侣，藏书简陋，难有开拓，但是由于地域之便，我常有机会访问在塔斯曼海峡（Tasman Straits）彼岸的澳大利亚，向



澳国大的柳存仁教授及其他先进如王赓武教授（香港大学校长）和罗依果博士请教，对于日后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启迪。1968年初，富路特教授邀我回哥大参加编纂《明代名人传》，于是辞退奥克兰教席。是年底，与内人返港省亲，然后重返纽约，投身于明史研究工作。在香港度假时，适逢港大中文系欢送罗香林师荣休，集稿出版纪念论文集，征文于门生故旧，于是将行篋携带的资料，勒成《读刘伯温〈烧饼歌〉》呈献，这是我首篇以中文撰述关于刘伯温的文章。前几年，香港珠海书院文史研究所筹印元一师逝世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又续写《〈烧饼歌〉新考》致意，增补了若干新资料。

从1969年春天至1972年夏季，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明人传记计划”充任研究员，进入另一阶段学术生涯。这个附设于东亚语文系的研究中心，系由美国亚洲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倡议，由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提供经费；此外，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及美国七八所设有重点中国研究的名大学亦拨款支持（澳洲国立大学亦曾赞助）。主要任务是编纂一部犹如在40年代，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典藏部主任恒慕义（Arthur W. Hummel）博士主编的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清代名人传》）（2 vols. Washington, D. C.,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943~1944）的传记辞典，借以推动明史去拓展中国近世史的研究。富路特教授为执行长及总编辑，副手是房兆楹与杜联喆夫妇。房氏伉俪为《清代名人传》的主要作者，此刻合作编纂《明代名人传》，正是相得益彰，为汉学界一盛事。我在普大写博士论文时，经常往哥大向他们请教，并在暑假时为该计划工作，撰写刘基传，因此留下印象，而这时刚好房夫人准备退休，需要一位较年轻的助手接班，富教授便给我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参与这一国际性的学术重任，真是意想不到。

此后三年半里，我全时致力于明史研究。我的职务是审阅外界的特约稿件和挑选明代人物撰写传记，因此竟日检读明朝的原手资料，包括《实录》、政书、碑传、文集、方志、笔记、小说等等，大开眼界，对日后的明史研究有无限裨益。在这期间，由于全神贯注在明人传记，经常参加有关明史或明朝以外的学术研讨会，需要撰写论文，并无余闲回到刘伯温研究，



只有随时摘录资料以备他日之用。不过，所撰的论文，有一篇是与刘伯温直接有关，那便是铁冠道人张中的预言传说的起源和演变。这篇论文取材于为《名人传》撰作的张中传（此传由已故的 Anna Seidel 博士拟稿，我作大幅修改，故此二人联同署名），它补充了我的《烧饼歌》初稿，指出这本预言书滥觞于张中的《蒸饼歌》，为刘伯温研究打下更坚实的基础。论文随送到德国的《极东学志》，于1973年刊出。这几年来，总共完成了八十篇明人短传，俱收入由富路特、房兆楹主编的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 ~ 1644*（《明代名人传》），于1976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刊行。是书上下两册，共1644页，我执笔的传记占了篇幅六分之一强，总算为明史研究作出点成绩。

上面提到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因为茫无头绪，对于刘伯温制造北京城的传说无法剖析，只好阙如，等候机会再作道理。这个机会，终于在我结束《明代名人传》的工作准备返港省亲，然后前往西雅图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任教的时候来临。1972年春，蒙古史专家司律义司铎（Fr. Henry Serruys）在美国蒙古学会（The Mongol Society）所编辑，庆祝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教授七十诞辰的纪念论文集，发表一篇极重要的论文。题目是：《蒙文钞本关于永乐皇帝的祖先为蒙古汗的传说》（“A Manuscript Version of the Legend of the Mongol Ancestry of the Younglo Emperor”），主要的资料是一份于1970年抄录，题名《大明永乐皇帝如何建造北京城》的蒙古民间传说故事。故事以蒙古相传永乐为元顺帝妥懽贴睦尔的遗子为背景，说当洪武皇帝怀疑这个王子不是自己的骨肉，把他谪戍到北平朔漠，责成在其地营建一座城市之时，王子得到生母硕妃的锦囊，恳求派遣谋士刘伯温随行襄助，结果得请，后来在当地遇到一位黑脸的黑衣黑骑异人，获他指授，请伯温依计行事，这座城市不久便在今日的北京建造起来。司铎把蒙文抄本作拉丁音写并翻译为英文，又附一简短序引，但没有钩稽明人史籍作深入分析。不过，这个资料给我打开刘伯温建造北京城传说的迷宫的钥匙，因为它解答了为何永乐、刘伯温虽然年代不相属[刘基卒于洪武八年（1375）]，传说却将他们结合在一起，而把伯温与北京建城套上关系。这篇论文并没有解答所有的疑难，尤其它并无涉及“哪吒城”



故事，但是它提示一面新的研究方向，使我领悟到要彻底解决这个谜案，需要从蒙古传说着手。因此，待我安顿下来计划写这本书时，便先投入研究这个北京建城的蒙古传说。这项工作，却要再搁延好几年才能实现，因为在完成《明代名人传》初稿不久，便准备迁居到西北岸，一时无法投入这件复杂的研究。

1972年初秋，我与内人及三岁的女儿以真来到西雅图，在华盛顿大学重执教鞭，晃眼间已过了二十年。华大是美国西部中国研究的重镇，自从50年代戴德华（George E. Taylor）教授创立远东及俄国研究所（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延揽各方名儒如萧公权、李方桂、施友忠、梅谷（Franz Michael）、卫德明（Hellmut Wilhelm）、包普（Nicholas Poppe）等任教，阵容鼎盛，课程充实，经费丰裕，一直为海内外莘莘学子所向慕，历年造就人才甚众，声誉昭著，国际驰名。我能有机会入华大执教，是出于卫德明教授的引荐、牟复礼教授的玉成。这时华大这些硕彦多已退休，在校的华裔教授只有施友忠、徐道邻、马逢华与张桂生；我的职位原是萧教授所据，他退休后由牟师来接任，但未几牟师重返普大，是职再度出缺。由于华大中国史的课程广泛，研究生众多，我的教学与研究范围因此逐渐扩大，包揽从宋至明的数朝历史，并且兼顾蒙古、女真等外民族，对个人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自此之后，我的研究与写作都集中在金史，亦兼及元史和宋史，主因是与傅海波教授有约，合作译注《金史》，仿照曩昔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与冯家升撰述《辽代社会史》[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8]之例，并得到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资助经费。不久，我开始撰写一本专书，探讨金朝章宗与宣宗之集议“德运”，推定金为“土德”上承宋之“火德”为正统王朝的政治与文化意义，作为《金史》研究的一环。这本书在1980年脱稿，题名 *Legitimation in Imperial China: Discussions under the Jurchen Chin Dynasty, 1115~1234*，为研究中国历代政权合法化的首创，但迟至1984年始由华大出版。1976年初，我接到王赓武教授与罗依果博士的



邀请，出任澳国大太平洋研究院远东史系的研究员，专司撰写元人传记，于是向华大请假一年，秋间举家（包括小女以真和两岁的长子以萃）前往堪培拉履新。一年间完成了七八篇传记，俱收入与罗博士及萧启庆合编的 *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Mongol -Yüan Period, 1206 ~ 1300*（《大汗之侍从：蒙元前期名人传记集》），此书已在1993年底由德国的 Harrassowitz 书店出版。在堪培拉时，因为参加研讨会，对明末思想家李贽（卓吾）的史料发生兴趣，闲来把新发现的李氏先人墓碑及有关传记资料译注，并附加他的著作及近人论述目录，汇编成一专书。这书未几完成，题名 *Li Chih (1527 ~ 1602)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New Light on His Life and Works*（《近代中国史学上之李贽》），蒙牟复礼师宠赐序文，又得到李又宁教授的协助，于1980年由纽约的 M. E. Sharpe 书店出版。因此，这一年的工作有相当收获，只是没有机会赓续刘伯温研究。

1977年秋天返回西雅图后，因为积稿亟待整理，加上要开新的教学科目，又以接受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聘请为该会中国文化研究小组的委员，并与哥大狄百瑞教授筹办探讨蒙元统治下之思想与宗教的研讨会，工作极为繁忙劳碌。这个研讨会于1979年冬在西雅图近郊的绮莎华（Issaquah）市举行，出席的中外学者有二十多人，论文甚多创见，讨论亦颇热烈，洵为一成功聚会，事后并编辑论文集出版。这个会议过后，新的工作又降临。事缘年前牟复礼师应《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的总编辑崔瑞德（Denis C. Twitchett）教授邀请，主编《明代史》，分上下两册，上册述政治，下册论制度，得到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家人文学科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of the Humanities）拨款支持，因此约我参加工作。由于机会难逢，于是答允，又向华大请假一年（1979~1980），举家回到普林斯顿（是时幼子以鸣刚好满岁），埋首撰述建文、永乐、洪熙、宣德四朝史事。上册蹉跎好几年，到1988年始出版，下册已经定稿，希望不日付梓问世。

1979年岁暮，我在普林斯顿工作方酣，却得一个意外的机会履足神交已久的北京，那是以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中国文化研究小组委员的身份，参加专团，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访华从事学术交流。全程一共三周，于圣诞



后一日出发，访问北京、成都、上海、南京、广州等城市，到翌年元月中旬才返美国。这次旅行最兴奋的是有机会亲履旧京，虽然时间短促，行程紧凑，我却能偷闲踱步天安门、故宫、景山、北海公园，也远足十三陵、颐和园和八达岭长城。此行不但浏览燕都名胜古迹，而且把多年在纸堆里打转的冥想与现实联结一起，加强我研究北京城的决心。此后有几次赴华参加学术会议，在首都作短暂停留时，也尽量拨冗到旧城内外徘徊瞻仰。这次初访神州，无疑是在普林斯顿工作一段最有意义的插曲，可是《剑桥史》的稿约限时完成，未有余晷从事其他的研究。

1980年秋天，我返回华大授课，以后两三年间都为清理积压劳形，不但要修订《剑桥史》明代篇的稿子，与狄百瑞教授合作编辑蒙元之思想与宗教研讨会的论文集（书名为 *Yuan Thought: Chinese Thought and Religion under the Mongols*），还需校对前此已完成的金代“德运”论议专书的排印稿。这两本书终于在1982和1984年分别由哥大与华大出版社刊行，了结多年的心头大事。在这时候，仍有一项未完成的工作，那就是元人传记的编纂事宜。于是，1983年夏天，再应罗依果博士的邀约，回去堪培拉澳国大十星期。在这期间除却修订元人传记，又接受当时任太平洋研究院院长王赓武教授的雅嘱，担任该年度的莫理循纪念讲座（George Ernest Morrison Memorial Lecture），以“Control of Publishing in China: Past and Present”“中国对出版事业管制之今昔”为题，在该院作一学术演讲，转瞬间三个月就此过去。

然而，没想到这个夏天却是我下决心去钻研北京建城的传说，解决这一谜案，动笔撰写这本小书的开始。主因不是工作时间表出现空当，可以重理旧业，而是在修订元人传记之时，意外发现足以破解一个多年令我困惑苦恼的问题的线索。这个线索来自刘秉忠的传记。事缘在增补这篇旧传时，检读刚出版的陈高华所著《元大都》（这书在1982年出版，一年后才在海外流通），发现两则冷僻的史料，修订了我对刘伯温制造哪吒城故事的缘起的推断。是书叙述刘秉忠设计营建大都城，曾产生“那吒城”的传说。这个故事首见张昱的“辇下曲”其中一首诗：“大都周遭十一门，草苫土筑那吒城，谶言若以砖石裹，长似天王衣甲兵。”随后署名长谷真逸撰的《农田馀